

二十世紀的香港

楊穎宇博士

總論

香港史作為香港中學會考課程內容，並非在 2004 年修訂課程才開始。早在 1960 年代，當時的香港中學會考課程已經涵蓋香港史。時至今日，香港已經脫離英國「殖民地」的身分，主權回歸中國。際此歷史時刻，回顧香港發展的歷程，饒有意義。

香港人讀香港史，不單趣味盎然，而且可資使用的材料俯拾皆是。就拿我們的「廣東話」¹來說，其發展、其蘊含的文化承傳，深具歷史研究的意義。以下從現今生活用語略舉一二為例加以說明：

1. 手電

「手電」或「手機」，是今天都市人必備的通訊用品，有些人甚至將它視為潮流飾物。可是，六、七十年前的香港，手電指的是甚麼？原來是「手電筒」。這一簡單詞語，不單表明戰前的香港已經有「手電」，教師也可以用以說明，香港在 1930 年代，是中國其中一個「手電」生產中心。這說明香港在戰前已有工業，甚至在抗戰頭幾年，當中國大陸大部分地方已經淪陷時，很多工業遷往「自由香港」，遂使香港成為了中國的工業重鎮。

2. 小姐

「小姐」與「先生」，是現代粵語對人通用的稱謂，做「香港小姐」更是很多少女的夢想。可是，1940 年代以前，稱呼女士為「小姐」，可以被視為一種侮辱，因為「小姐」暗示對方是交際花，在男主外、女主內的那個年代，是有違禮節的。當時一般稱女士為「姑娘」，例如在英語裏某人若稱為 Miss Lee，中文便會寫成「李姑娘」。香港小姐競選在 1973 年被無線電視壟斷以前的廿多年

¹ 又稱粵語、廣州話、白話。

間，自 1946 年第一屆香港小姐開始，競選多是由大型夜總會如麗池夜總會(現址鯉魚涌麗池大廈)主辦。初時參初者很多都是舞女，參加人數也十分少(例如 1946 年第一屆香港小姐只有 16 人參賽)，這進一步說明「小姐」、「香港小姐」這些詞為何具貶意。

3. 導遊

旅遊業在香港具有很長的歷史，1929 年全球經濟危機波及香港後，港府籌謀多元化的經濟策略，除積極發展各種工業外，還著力發展旅遊業，於 1935 年成立了「香港旅行會」(Hong Kong Travel Association)，對中國大陸和海外推廣香港旅遊業。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香港百業蕭條，港府也銳意發展旅業，很多年輕人都視導遊為就業選擇之一。然而，在戰前，「導遊」是一個「很壞」的職業。1930 年代初，香港禁娼，部分娼婦轉為暗娼，以「導遊」為掩飾。結果是，「導遊」成行成市，成為了內地因戰亂僑居香港的執綳子弟消磨日子的對象。香港淪陷前夕，有關「導遊女」的廣告，在一些報紙如《南強日報》² 每天均佔三、四大版之多。如果說，「香港小姐」當時是指交際花、不務正業的婦女，「導遊」則是在道德上不被接納的一群。³1973 年邵氏電影《七十二家房客》，故事背景為抗戰時期，警察三六九有一句話：「做導遊女？那不就是做妓女？」這實在是一針見血。

從以上討論可見，香港史教學，雖然可以像中國史、世界史般同樣以報紙、漫畫、政府文獻等作為課堂教學討論的基礎，但由於香港是我們成長的地方，教師的人生歷練，其實已經積累了一些對下一代而言十分珍貴、十分有趣，卻十分陌生的原材料(其中一個屬於各位的「集體回憶」，當是 1979 年無線電視劇《網中人》中廖偉雄的「阿燦(全名『程燦』)」)形象。大家可以此考一考學生，「阿燦」這個形象怎樣反映文化大革命後內

² 香港大學圖書館有藏。

³ 當然這是有例外的。抗戰開始後，部分「導遊女」掛上了愛國的旗幟，舉行「義務勞動」，將某些日子的收入作抗戰獻金之用。

地與香港在經濟、文化、價值觀上的差異)。這些材料，若運用得宜，可生動概括地讓學生明白一些歷史側面、轉變與延續等情況。

1. 以香港史討論「本地、國家、亞洲、世界」四個層面的相互關係

2004 年修訂課程的其中一項目標，是學生能夠了解「二十世紀期間本地、國家、亞洲以及世界的主要事件/運動之間的相互關係」。縱觀整個課程，只有香港史這個部分能夠突出這種「相互關係」，原因是只有在研習香港史時才可以綜合本地、國家、亞洲、以至世界四個層面，對某事進行探討。當然，會考生程度有限，授課時間緊逼，不能事事作如斯深入的探究，但若條件許可，教師仍可一試。以下試舉二例加以說明：

(一) 省港大罷工

省港大罷工在內地的史書中，被定性為偉大的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鬥爭。然而，省港大罷工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香港，是很多因素互相催生的結果。教師可嘗試從「本地、國家、亞洲、世界」四個層面加以剖析：

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全球經濟衰退，傳統的殖民大國被新興工業國(美國)迎頭趕上。

亞洲： 英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受削，不單香港如此，在印度也得與逐漸興起的民族主義力量妥協。

國家： 民族主義冒升，革命勢力在聚集於南方，向受各國承認的北京政府施壓；在廣東，國民黨與共產黨勢力上升，宣傳反帝反軍閥思想。

本地： 自辛亥革命後，在港華人民族心有所提升，曾在 1910 年代發生電車罷搭事件⁴、行刺港督梅亨利等；加上香港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物價上升，容易觸發工人罷工。

(二) 香港回歸「過渡期」的民主發展

⁴ 辛亥革命後，廣東因革命動亂，粵幣幣值下跌；因粵幣在港通用，香港電車公司於 1912 年決定不收粵幣，遂引發擺搭事件。

1990年代是香港政治文化的轉捩點。香港由1980年代以前毫無民主、1980年代開始在《聯合聲明》所容許的有限空間探索民主，到1990年代香港人對民主的渴求，不純粹是一個香港本地現象。它有極深刻的現實背景。

世界： 1991年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陣營崩潰，冷戰正式結束。美國成爲了唯一的超級大國，認爲共產政權必定滅亡。

國家： 自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積極開拓與資本主義各國的關係。然而，「六四」一役，改變了這個有利的趨勢，各國紛紛譴責中國。中國認爲，這是資本主義陣營在「後冷戰時期」對中國的陰謀。

亞洲： 中英爭拗，令香港不穩，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初見長成，如何鞏固這個成就，成爲一個急切的問題。

本地： 中國是共產主義國家，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回歸中國，前途未卜。中英談判，港人未能有代表出席，加深憂慮。「六四」事件，港人恐共心態一發不可收拾，很多人祈求快速建立民主，希望能改良政制避免中共滲入立法機關，實行「民主抗共」。

除了「世界→本地」這條線外，有沒有「本地→世界」這一方面的影響？當然是有的，最明顯是流行文化。踏入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傳媒向大眾化邁進一大步。電視劇集、粵語流行曲紛起，「港式中文」登上大雅之堂。各式文化、娛樂產品遠銷東南亞，內地開放後更成爲家家戶戶的消遣恩物。香港成爲港式文化的出口港，對亞太地區甚至全球影響深遠；香港通過李小龍電影向全球輸出了功夫文化；成龍電影的武打場面成爲了全球電影人模仿的對象。時間再向前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段頗長的時間內，香港出版的教科書，曾遠銷東南亞。

不過，從現實角度看，課程容許討論四個層面的史事和空間畢竟有限，能貫通四個、三個、甚至兩個層面的共通點不多，所以教師在這方面不須過份憂慮。

2. 「現代化」對香港的意義

香港史在修訂課程中是置於「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與轉變」這個框架之下，因此教師在教學時，無可避免會碰到以下問題：香港在哪些方面實現了現代化？甚麼時候實現了現代化？香港與其他地方相比，現代化程度如何？

與中國近現代史不同，香港史的研究上很少使用「現代化」一詞，原因很容易理解：與中國大陸相比，香港實現現代化的時間十分早，在成為英國「殖民地」後半個世紀，已經從華南邊陲不起眼的小島，發展成為全球第一大港，港口吞吐量超越了利物浦、倫敦、紐約等世界大港。1905年英國一本介紹大英帝國「殖民地」的書中有以下一段文字：

「香港是大英帝國面積最少的殖民地，但在一些方面它卻是最有趣的。……1900年，香港在船務方面超越世界所有港口。在輪船入港與清關噸位數而言，香港超出利物浦五百萬噸、漢堡一百萬噸、倫敦和紐約五十萬噸。實際數字為：香港 17,247,023 噸，紐約 16,797,700 噸，倫敦 16,000,527 噸，漢堡 16,087,673 噸，利物浦 11,677,708 噸。」⁵

因此，香港在港口設施、公用事業和設施(如水、電、煤氣、通訊、交通等)等方面，在二十世紀亞洲甚至世界均名列前茅。例如，1907年太古船塢建成，成為亞洲最大船塢，能容納鐵達尼號等級的輪船入塢，進一步提升了香港作為世界大港的航運能力。

除了經濟方面外，香港的現代化最觸目的方面是城市化。雖然香港的已建成面積佔全港面積僅十分之一，但大部分已建成面積從前都是農村用地。將現今香港地名與差不多二百年前的《新安縣志》對比一下，便可以很容易發現，香港當時的村莊今天已成了繁盛城市的一部分：

「官富司管屬村庄：屯門村、梅窩村、烏溪沙、馬鞍山、小瀝源、長沙灣、深水莆、九龍寨、牛池灣、九龍仔、尖沙頭、土瓜灣、芒角村、黃泥涌、香港村、蒲靛林、掃管莆、赤磡村。」

⁵ Hong Kong is one of the smallest colonies in the British Empire, but in more than one respect it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in the year 1900 Hong Kong stood at the head of all ports of the world in the magnitude of its shipping. In tonnage entered and cleared in 1900 Hong Kong surpassed Liverpool by five million tons, Hamburg by one million, London and New York by about half a million tons each. The exact figures were: Hong Kong: 17,247,023 tons, New York: 16,797,700, London: 16,700,527, Hamburg: 16,087,673, Liverpool: 11,677,708. Alleyne Ireland, *The Far Eastern Tropics: Studi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ropical Dependencies: Hong Kong, British North Borneo, Sarawak, Burma,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French Indo-China, Java, the Philippine islands* (Westminster: Archibald Constable, 1905), p.15.

「官富司管屬客籍村庄：九龍塘、沙田、大埔圍、吉澳。」⁶

除新界外，港、九多是山地，缺乏平地發展。當都市擴張時，往往需要徵用村地。因此，村落的消失，除了荔枝窩等因村民流失而成爲了「廢村」外，多數是因爲城市化而直接造成的。舉一個例子：北角七姊妹村，原址爲今日健康邨一、二期，香港開埠之初已經存在。它於 1931 年在地圖上消失，所有村民均遷走，原因是政府徵地，以便擴大七姊妹石礦場。現在只留下「七姊妹道」一名，供後人緬懷這個曾經十分重要的地名。⁷

由於香港實現現代化時間較早，它甚至成爲了中國進行現代化時的學習對象。孫中山回憶在香港讀書時，曾說：「在香港讀書，功課完後，每出外遊行，見本港衛生與風俗，無一不好。……因香港方開埠不過七八十年，而內地已數千年，何以香港歸英國掌管，即佈置如許妥當。……又見香港之腐敗事尙少，而中國內地之腐敗，竟習以爲常，牢不可破。始初以爲我敝邑香山一縣如是，及後再到省城，其腐敗更加一等。……深願各學生，在本港讀書，即以西人爲榜樣，以香港爲模範，將來返國，建設一良好之政府。」⁸ 其中一個被內地模仿的對象，是香港的路政。以廣州爲例，它於 1889 年開始興築新馬路，縱觀晚清幾十年，香港的市政路政成爲了它的模範。

中國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毗鄰實行資本主義的香港，成爲了最方便、最現成的借鑑對象。1980 年代，內地政、經單位紛紛派團到港進行交流，學習香港成功的經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嚴重摧毀的文化界，對香港的流行曲、電視劇、電影視爲甘露，大加吸收。

若論及香港的現代化有何特徵，簡單來說有以下數項：

一、香港早已實現全球化

香港的開埠史，便是一部步向全球化的歷史。1841 年，英軍宣佈香港爲自由港；當年香港第一次賣地，英商渣打投得東角(今銅鑼灣)一段。隨著轉口港貿易的發展，香港成爲東西方交通輪紐，也是內地人民往來南洋、日本、歐美的中轉站。早在 1877 年，港督軒尼詩在一次定例局(即今立法會)發言中說，香港是「全球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航運中

⁶ 見舒懋官、王崇熙等，《新安縣志》(嘉慶 25 年，1820 年)。

⁷ 戰前雖然已經存在 North Point 一名，但這多流行於非華人之間；華人一般稱北角爲「七姊妹」。

⁸ 《華字日報》1923 年 2 月 21 日；<http://www.hku.hk/daao/sunyatsen/syspaddress.html>。

心」。每年進出香港的船隻數量，以現今航運業相對息微的情況比較，尤其驚人。以1916年為例，進入香港並已清關的船隻數量為 642,794 隻，噸位達 36,381,457 噸。這些船隻，註冊於全球不同地方：英國、法國、德國、荷蘭、希臘、美國、日本、智利，等等，尤其是經營東亞航運的公司，均在香港設有辦事處。因此，早在轉口港時代，數十間世界各地的船公司旗幟每天飄揚於香港港口內，每逢有大洋船出入港口，便會鳴放禮炮。

除船運外，香港與世界各地保持著密切的貿易關係。以水泥(又稱英泥、士敏土、石屎)為例，由於本地建設造成大量需求，除了有本地的青洲英泥廠的生產外，香港還從比利時、德國、意大利進口水泥。20 世紀初，香港已有相當工業存在，這些工業包括重工業和輕工業(製造業)。以錫為例，當時香港從雲南、廣西、馬來西進口原錫，進行精煉，然後將成品出口到英國、美國、中國、日本等地。

由此可見，香港不是在成為金融中心以後才有「全球化」這個現象。「全球化」於香港開埠後不久已存在，是香港最核心的「核心價值」。

二、多元化與潮流化

「全球化」不一定能達致「多元化」。香港得西化風氣之先，加上其特殊的政治及地理形勢，形成了兼容並蓄的局面。甚麼「國際美食」之類的表面多元化不說，香港對於本質對立的現象和文化具有頗強的包容度。以民國時期為例，以陳伯陶為首的晚清遺老仍然在活躍於香港，並以「借古喻今」的方法將宋王臺的歷史加以發揚；與這種「舊文化」並存的，是開始出現於香港的新文學。中共建國後，因為革命文化成為主流文化，摒棄了很多舊藉，這些舊藉的鉛印板運到香港，使香港成為「舊文化」的集散地，印製的書籍不單暢銷於香港，還出口東南亞華人社區。

然而，由於香港是一個以商貿為主體的城市，商民皆重視「功利」，多元化往往受制於潮流化，「求新」成為香港現代化一個恆常現象。文化元素會像股市一樣，經常處於波動之中，難以形成固有的「香港文化」。由於潮流多是進口而來，所以香港的文化受制於進口了些甚麼。過去了的，很難被主動重新發掘，所以當文化保育這個議題被提上日程後，社會的討論仍不算熾熱。本地文化，不要說推廣，要保存也非易事。筆者若干年前，曾於屯門善慶洞拜祭先人，目睹以下傷心事：當時有關方面正將全園裝修，將香港大學中文系第一任講師賴際熙(1865-1937)為他們撰寫的石牌匾打碎。賴氏為晚清太史，於 1923

年在香港創辦了「學海書樓」，以傳揚國粹。他是戰前香港著名學人，但人非物換，當初求來的墨寶，現今已成礫石。這反映了香港社會中新人新事總是比較容易獲得垂青，舊人舊事難以凝固成模楷、經典、集體回憶。像我們的父輩中有一句慣用語：「咸豐年的事講黎做乜？」

三、依賴入口

「全球化」意味著不可獨善其身。香港由於資源缺乏，加上人口擴張太快，絕大多數的商品供應、生活所需，均需依靠入口。以食水為例，一般認為香港向內地購買食水始於 1965 年(即所謂「東江水」)，然而，由於香港人口擴張太快，食水供應很早已經成為都市問題。港府除了不斷興修水塘外，早於 1929 年已派船到珠江運水供港。⁹ 19 世紀末取得新界之初，其中一個想法是利用新界的農產滿足港九人口的需求，以減少進口；然而隨著人口增加，新界的農產佔全港需求越來越少，香港仍得依靠進口食品及副食品。

3. 影響香港歷史發展的三項意識形態

雖然香港是一個功利的社會，但並不是說香港人不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在港華人一直受若干意識形態的左右，其中最明顯的是回歸後某些機構／團體每年都會就香港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進行研究調查。事實上，在內地，例如一個廣州人同時可以擁有「廣州人」、「廣東人」、「中國人」等不同身分。在香港，對原本不存在對立的身分作如斯斟酌，意味著香港人對於意識形態問題存有莫大的張力。

以下簡論影響香港歷史發展的三項意識形態：殖民主義、民族主義、本土意識。

一、殖民主義

香港自 1843 年至 1997 年的 150 多年間，作為英國「殖民地」，殖民主義自然對香港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最大的影響，在於使香港人抱有一種與內地人不同的態度面對殖民主義。中國大陸一直受到革命史學的支配，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是中國革命必不可少的背景因素，所以「殖民主義」是中國大陸史學的譴責對象。民族的仇恨，在香港不能說

⁹ 見 1929 年香港致英國殖民地部報告，R.L. Jarman (ed.), *Hong Kong Annual Administrative Reports, 1841-1941, vol.4* (Farnham Common: Archive Editions, 1996), p.323.

沒有；例如回歸前後美亞娛樂出品的《香港滄桑》VCD，嘗試對港人引進這種史觀，利用 19 世紀華洋分治、港府對華人施用「大清律例」刑罰等，營造殖民地不公正、不公平的形象。然而，踏入 20 世紀，尤其是「六七暴動」之後，殖民地政治和社會經歷了大幅改造。1970 年代以後，由於麥理浩為香港帶來了「黃金十年」，英治更成為了香港發展為「亞洲四小龍」的必要條件，因此這一代的港人很多對英治不恨反愛。英國在香港所創造的成就，甚至在《基本法》之下得到保護：所謂五十年不變，本質上就是保證英治造就的成果不受影響。鄧小平在 1980 年代提出要在內地「造幾個香港」，本身已蘊含了對英治成果的肯定。

二、民族主義

香港作為「殖民地」，其中一個特殊的地方，在於它與祖國僅一河之隔。香港的華人，與內地華人同宗同祖，與內地關係密切，他們在戰後身分證制度出現以前，可隨時過境進入內地。因此，港府對華人的管治，往往受內地政局發展的影響；華人也往往受內地政局發展的影響，而改變對殖民地政府的看法。

在那個「返大陸」不是為買翻版 DVD、不是為找廉價按摩、回鄉討老婆是天經地義、死後要移屍安葬老家、華人在香港是「華僑」而非「香港人」的年代，香港華人與內地是真正「血濃於水」。一種樸素的愛國心是必然的事。所以 1884-85 年中法戰爭時期，香港便出現了反法罷工：香港碼頭工人拒絕為法艦裝御貨物，船塢工人拒絕修理工國軍艦。上述 1912 年香港電車案、1925-26 省港大罷工，是中華民國成立後香港華人對港府的挑戰行爲。當然，華人對港府的「挑戰」是否必然具有民族主義因素，必須具體分析。例如 1933 年港紳周壽臣、曹善允、周俊年等上書港府，反對將七姊妹(即北角)泳棚填海發展成工業區，理由是游泳已是香港必不可少的活動，而七姊妹位置適中，不可取代。由是香港出現了一次「營救七姊妹運動」，最終港府收回成命，日佔以前並未在該區進行填海。¹⁰ 這說明，香港華人在市政事務上表現相當成熟，而港府也會對華人要求擇善而聽。

1937-41 年間，是民族主義在香港發展的重要時期。早在蘆溝橋事變前，香港的社會團體如商會、青年會等，已紛紛舉辦各種講座、讀書會，讓市民認識內地最新局勢。至

¹⁰ 參見吳灞陵，「營救七姊妹運動」，《華僑日報》1948 年 4 月 19-31 日。

日本全面侵華後，香港各界紛紛組成救國團體，甚至連學生也參與在內。以香港大學學生會牽頭的香港學生賑濟會，發動港九中、小學生，進行抗日宣傳，甚至派出「回國服務團」前往國內。一些華人團體如「香港中國婦女會」，也是於當時成立，目的是為抗戰籌款。至國內多數省份淪陷後，國內抗日團體紛紛遷至香港，使香港成為了抗日中心。

如果說抗戰時期中國實現了短暫的民族團結，抗戰結束後中華民族便因為國共之爭而出現分裂，並持續至今。國共兩黨均自稱中華民族的正統，兩黨的支持者在香港的對立漸趨激烈，甚至屢有衝突。例如，港府於 1940 年代末撥出港島摩星嶺一處地方，供國民黨在港人員及家眷居住，原意是以為該處已遠離市區，應可減少與共產黨支持者發生衝突的機會。然而，1950 年，共產黨支持者卻前往該處，跳著當時在內地十分流行的「秧歌舞」，並與國民黨人員發生了流血衝突。事後港府認為需要另覓更遠離市區的地方，結果是造成了調景嶺這個存活了 40 多年的「青天白日滿天紅」堡壘。

縱觀 20 世紀下半葉，國共兩黨在香港爭取支持者，造成華人內部的身份認同出現分裂。社會上出現了所謂左派、右派，工會、社團、學校、報館等等，均出現了左右的分裂。家庭因為政治意見不同而造成不和，時有發生。政府對「中國概念」頗為敏感，以至當時教育署要修訂中學歷史科的中國史部分，事前必須得到政治部同意方可進行。不過，一般市民會選擇遠離政治，社會上因此存在著「政治冷感」。

三、本土意識

「本土意識」，即香港的居民對香港的認同高於其他地方，尤其是他們的祖家(中國、英國或其他國家)。「本土意識」原本在香港沒有任何滋生的土壤。首先，除新界外香港幾乎所有居民包括華人在內都是移民。在港華人至 1960 年代仍自稱「華僑」，意思是他們就算長居香港，也只當香港是異域，是寄居他鄉。香港和澳門華人長期以來被內地稱為「港澳僑胞」，所以我們有《華僑日報》、「僑校」、「華僑社團」等各種與自己華僑身份適切的名稱。所謂「本土意識」的出現，便是一個由「華僑」變「香港人」、變「他鄉」為「故鄉」的過程。

事實上，香港華人無論何時均與中國大陸保持密切的連繫，香港華文報紙多大幅報導有關中國大陸(尤其是廣東省內)的新聞；相反，對香港社會多抱有「過客」的心態。在文化大革命前後，在港華人若在內地有親友，往往會將新舊衣服、家庭用品等帶回內地接

濟他們。這是在麥理浩「黃金十年」時期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距離越拉越大的時候仍然發生的。然而，就是香港這個經濟基礎，加上中國大陸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經濟、社會、文化滑落，香港的優越感開始形成。戰後第二代華人開始在港紮根，視香港為家；粵語文化開始興起，以取代國語流行文化。

不久，香港開始出現前途問題。如何在一個前途未卜的共產主義社會下保障香港固有的生活模式——這個切身的問題令「政治冷感」的香港人開始關心政治、關心自己的身份問題。組結政團、編集掌故、保護古蹟等方面的工作，說明香港人通過不同方法嘗試把握自己的過去、當下、未來。然而，本土意識的發展，令親北京人士感到不安，以致在九七回歸後，出現了「主權回歸，文化未回歸」的言論。

4. 何謂殖民地

1843 年，英國向香港頒布《英皇制誥》、《皇室訓令》，規定香港是英國的一個殖民地。何謂殖民地？「殖民地」可以簡單地定義為「強國開拓或侵佔本土以外的疆土」；然而，「殖民地」與「國家」一樣，種類不一。「國家」可以有若干類別，有以君權為中心的(如摩洛哥、尼泊爾等)，有以神權為中心的(如梵蒂岡、伊朗等)，有以軍權為中心的(如巴基斯坦等)，有以民主為中心的(如美國、日本等)，有一黨專政的(如中國、北韓等)，等等。至於「殖民地」，最早於古羅馬時代出現，羅馬向被征服的土地派出軍隊沿海駐守，至公元前 200 年這類沿海殖民地遍布意大利，主要功能是海上防衛。後來，凱撒建立了另一種殖民地，將老兵和無業者送往國外，以提供謀生途徑。到了 19-20 世紀，殖民地的擁有與否成了國力的指標。目睹歐美之盛，中國人也希望擁有殖民地。中國的知識分子也積極提倡。梁啟超於 1904 年著「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曰：「海以南百數十國，其民口之大部分，皆黃帝子孫，以地勢論，以歷史論，實天然我族之殖民地也」，祈望中國「有能擴張其帝國主義以對外之一日」。康有為也著有「殖民巴西計畫」，曰：「中國人滿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經緯度與吾近。……可以為新中國……擬組百萬殖民公司。」¹¹ 可見，「『殖民地』」這名詞的原始語

¹¹ 「新中國」一詞，於晚清以後成為中國一個日常用詞，而非中共所建之政權所專用。凡是國民對將來有所祈望時，都會使用「新中國」一詞。惟大規模使用者，凡四次：1912 年之中華民國新政權、1928 年南京政府政權、1945 年還都南京、1949 年中共建國。

義其實並不含善惡成份。」¹²「殖民地」成爲貶詞而被否定，當是在後殖民主義出現之後、本地人爭取獨立時的一種抗爭手段。

至於英國的殖民地，大致可分爲兩種：

- a. 「自治領」(dependency)：有自治的政府和防衛本地的軍隊，大量英國人移民該處，例子包括北美十三州殖民地、錫蘭、毛里裘斯、澳洲、紐西蘭等。
- b. 「直轄殖民地」(crown colony)：僅作保護英國在外商業利益而設，沒有自治政府，例子包括香港、馬爾他、直布羅陀、福克蘭群島等。

香港雖然名爲「殖民地」，但其設立並非爲英國海外殖民而設，而是英國在遠東一個貿易場(emporium)，所以香港一開埠便宣布了自由港的政策，直至今天。香港的「直轄殖民地」身份，影響著其政治社會特點：

a. 行政主導

香港的開埠，自始至今，宗旨如一：成爲具規模的商埠。因此，政制的主導力量是代表英皇的總督。無論英商或華商，若提出的改革方案，對居於香港的其他種族人士不利，便不予考慮。

b. 小政府

香港政府直至第二世界大戰前夕，一直規模不大。它只提供基本的治安服務和與工商有關的管理服務，雖然在 1920 年代開始考慮爲中下收入市民提供廉價房屋，但社福需要主要依靠市民互助，如同鄉會、東華醫院等。政府於戰前只有 33 個「政務官」(Administrative Officer)職級人員。到了戰後，由於內地移民到港數目激增，政府需要在醫療、衛生、教育、房屋等各方面增加職能，公務員人數也隨之增加，到了 2008 年，單是政務官的人數便已經超過 1,100 人。

c. 商人主導

香港既爲商埠，香港的精英階層，自然是經貿圈中人士。港府政策是否良善，與他們有密切的利益關係。1840 年代，第二任港督戴維斯(John F. Davis)爲改善港府收入，推行人頭稅，遭英商大力反對，向英倫抗議，結果戴維斯被召回英

¹² 《明報》，1983 年 7 月 28 日社論。

倫；十九世紀中葉，港府提出大規模填海計劃，佔據中環碼頭區的業主大力反對，最後港府僅能成功進行了「寶靈頓(Bowring)計劃」¹³，而中環大規模填海計劃要遲至 1890 年才開始。有見及此，港府開始吸納經貿界人士進入定例局、議政局(兩者於 1946 年改名立法局、行政局)，「商人主導」的局面正式形成。

最後要說明的是，當今有些人爲了避免使用「殖民地」一詞，或者要將回歸前的「港府」與回歸後的「港府」加以分辨，會以「港英政府」一詞形容殖民地時期的港府。這是一個不恰當的稱謂。「港英」一詞，是具有強烈反英意味的用詞，意爲「香港英帝國主義」(British Imperialism in Hong Kong)，回歸前只有左派才會使用，其根源是六七暴動期間，左派高舉「港英必敗，我們反勝」的旗幟。「港英」一詞，與「滿清」(反清革命人士使用)、「匪共」(國民黨使用)、「匪蔣」(共產黨使用)等名詞一樣，是政治宣傳的產物，而非恰當的學術用語。與使用「中共」代替「中國」一樣，用「港英」代替回歸前的「香港」，明顯存在意識形態判斷。

5. 不平等條約概念的出現

回歸後的公民教育其中一個成果，是讓學生們「知道」香港成爲「英國屬土」的過程，是由三個「不平等條約」組成：1842 年《南京條約》、1860 年《北京條約》，以及 1898 年《拓展香港界址專條》。然而，這些學生並不知道，這三個條約簽署之時，「不平等條約」這個概念並不存在。這個概念在中國要待至 1924 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才告出現。然而，就算北伐成功，南京政府也只能通過談判收回各地租界及各種特權。在未達成新約之前，現存的條約還是需要恪守的。因此，民國時期中、英兩國雖然就香港主權進行過磋商，但其基礎是上述三個條約仍然有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改變以往中華民國的外交政策，一概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有關香港的三條條約，亦在廢除之列。然而，直至 1982 年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以前，英國在香港的管理，其基礎無疑是以上三個條約。

¹³ Bowring 的意思，是於寶靈(John Bowring)在任總督期間(1849-1859)填海而成的新市鎮(town)。

根據國際法的觀點，「不平等條約」這個詞並不具有法律效力，換句話說，某國政府若認為某條約屬「不平等條約」，仍需與有關簽署國進行談判，以解決有關問題。「不平等條約」這個概念的出現和使用，僅能為「被害國」在談判桌上提供一些道義上的支持，但談判結果如何，還得依靠現實政治的各方條件。

6. 港九與新界

一個地名，透過不同的濾鏡觀察，可以折射出不同的光譜。香港作為一個政治概念，可以看到中英角力、回歸前的政制磨擦、華人尤其是精英之間的「雙重效忠」¹⁴等政治現象；作為經濟概念可以看到轉口港發展、工業化、金融中心，甚至鴉片(鴉片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佔港府收入高達 40%)等。這些都是較為人所熟知。比較少人注意的，是香港作為一個地理概念的歷史演進。

簡而言之，香港由香港、九龍、新界三個部分鼎足三立、各部分保持相對獨立身分，逐漸變成三者界線模糊以至合一的格局。1970 年代以後，由於逐漸發展出「集體運輸系統」，今天的「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路線覆蓋了香港、九龍、新界；以前我們會說「我要去新界」或者「我要去九龍」，會較多使用地區名稱指代，現在則傾向會說「我現在旺角」、「我仍在元朗」等以具體地點名稱指代。另一方面，「集體運輸系統」以及海底隧道的發展，使從前是日常必需的渡海小輪淪為次等交通工具，其結果之一，是改變了香港地理在日常言語中的表述方式。「過海」這個在海底隧道未建成之前使用率極頻繁的日常用語，現在已經「靠邊站」。這不單反映了渡海小輪沒落的現象，也反映了在香港這個由 262 個離島組成的、海洋面積佔全境面積約六成的地方，「海」離開我們的日常生活越來越遠。¹⁵

在陸路能連接港、九、新界以前，三者的關係有着不同的特點。首先，香港與九龍被視作兩個不同的城市；既然屬於不同城市，同一街名自然可以在兩個城市同時出現。所以 1909 年以前，香港和九龍都有羅便臣道、麥當奴道，等等(見下表)。

¹⁴ 即同時保持對英國和對中國大陸政權(大清、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聯繫和效忠。

¹⁵ 另一例子是從前到烏溪沙青年營，需在馬料水乘船前往；現在隨着馬鞍山的發展，已可徑直從陸路前往。

現名	原名
彌敦道	羅便臣道
廣東道	麥當奴道
漆咸道	德輔道
海防道	伊利近道
北京道	遮打道
吳松街	堅尼地街

由於香港日漸發展，郵政漸趨繁忙，1909 年港府決定將重覆的地名更改，以免郵遞錯誤。然而，香港的「雙城記」，仍然繼續向前：香港和九龍有各自的電燈公司(香港電燈、中華電力)、巴士公司(中華巴士、九龍巴士)；甚至 1980 年及以前香港的電話仍是按區劃分的，即香港區是五字頭，九龍區三字頭，新界則是零字頭，撥打同區的電話號碼則免打字頭。港府在 1970 年代大力發展新界新市鎮以前，新界仍是鄉郊、郊遊之地，工商業均未發達，港、九則是香港唯一已發展地區，因此，很多社團在命名時只冠以「港九」而非「香港」，如港九天台學校聯會、港九勞工社團聯會、港九油漆業總工會、港九電器商聯會、港九洋服商聯會、港九無線電聯會等，¹⁶ 當新界發展後，部份團體將名字中的「港九」改為「香港」，例如港九工會聯合會後改稱為「香港工會聯合會」，以表示服務的地區擴展至新界。

SWINDON BOOK CO.

13-15 Lock Road, Kowloon, Hongkong
TEL. K-668033, K-668001

STATIONERY & PERIODICALS
64, MIRADOR MANSION
NATHAN RD. KOWLOON
TEL. K-662046, K-668555

NEW BRANCH
249 DECK 2, LANTAO GALLERY
OCEAN TERMINAL
TEL. K-673242

1970 年一間書店的廣告。留意電話字頭為 K，即 Kowloon；若是香港區則為 H(Hong Kong)，新界則為 N(New Territories)，分別代表 3、5 及 0。

至於新界的發展，至 1960 年代，仍屬緩慢。至 1960 年代，雖然觀塘、荃灣已漸次發展，但沙田、粉嶺、大埔、元朗、屯門、將軍澳、天水圍、大嶼山等新市鎮的發展，仍

¹⁶ 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中有很多團體仍以「港九」冠名。例如可參考批發及零售界功能界別的組成 (<http://hkcllc.org/hk/legis/ch/ord/542/sch1c.html>)。

需待 1970 年代或以後。1960 年代，新界的基本功能，除了農業外，仍是郊遊；1950、60 年代的粵語長片，往往以新界鄉郊取景。那時的九廣鐵路，來回尖沙咀¹⁷每天只有 40 多班。1970 年代，無線廣播興起，電視台要特派記者進駐新界，可見吐露港公路、屯門公路、三號幹線未興建以前，新界仍離市區很遠。

事實上，早於 1941 年香港淪陷前，港府已經計劃發展大嶼山和荃灣，原因是當時大量大陸難民湧入香港，人口由 1937 年的 60 萬急升至 1941 年的 160 萬，土地嚴重不足，甚至連基本糧食供應也不能保證。當時的想法是發展荃灣作商住用途，大嶼山則作為墾殖用途，以便大幅增加糧食供應。然而，由於戰事迫在眉睫，該計劃不能實行。

順帶一提，新界一名在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以及香港回歸過渡期內曾經被「邊緣化」。香港、九龍、新界三地，前兩者在英治以前已經存在，不存在合法性的問題；然而，新界一名，在 1898 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署時並不存在，而是該條約簽署後港府因地制宜，並這一大片仍屬九龍半島的新增土地名為新界(new territory)。中國方面認為，這個名字本身就是殖民掠奪的結果，所以在 1980、90 年代，在內地出版的有關香港刊物，甚至《中英聯合聲明》，新界一名均加上引號，將之定性為一個政治不正確的用語，以否定新界的合法地位。然而，回歸以後，由於該地名已經深入人心，地方行政以至直接選舉等也是以該三區的劃分為基礎，加上新界問題是一個政治表述而非旨在摧毀實際上的新界行政，新界一名便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

空間與政治，從來都有很密切的關係。透過香港、九龍和新界的地理關係，歸納出三者和功能上的關係，可以進一步理解香港的歷史演進。上述的「雙城記」，嚴格來說，並非指香港和九龍，而是域多利亞城(Victoria)與九龍(Kowloon)。開埠以後，隨即建設起域多利亞城，是為香港的首府(capital city)，西起堅尼地城，東至銅鑼灣。首府的市中心地段則為「中區」(Central District)。這個中心格局，自 19 世紀中葉至今仍未改變。

作為一個國際城市，20 世紀上半葉香港的域多利亞城和九龍建構了一個國際大港。尖沙咀和中上環是碼頭區，來自遠洋的班輪(liner)停泊於此，經尖沙咀九廣鐵路接駁往內地的火車或在中環接駁往省城的渡輪；而在尖沙咀下船的旅客，會乘坐天星小輪或嘩嘩(一種機動小艇)到中環住宿及遊覽。另一方面，由於香港島的地價不斷上升，無論

¹⁷ 九廣鐵路南端總站自 1916 年一直位於今尖沙咀文化博物館處，1978 年拆卸後，才遷往紅磡。

中外人士皆難以支付高昂的住宿租金，而隨着渡輪及汽車渡輪的出現，港九交通得到改善，很多人便從港島遷往租金較便宜的九龍半島居住。從這方面看，九龍起着支援港島經濟建設的角色。另一方面，戰前的九龍半島人煙仍屬稀少，因此有大量土地可用作工業及運輸發展，例子有紅磡的黃埔船塢、青州英泥廠、中華發電廠及紅磡火車總站，以及九龍灣的淘化大同。相比之下，商業的菁華則集中於港島的中環及上環，前者是外商為主，後者則是以華人為主的南北行、金山莊等。由此可見，港島與九龍既存在中心——外圍的關係，也存在分工上的不同。

至於新界，在新市鎮未興起之前，一直以地方大族及原居民為主，目前仍存有一些圍村及祖祠。保留下來的建築和習俗，卻無意間為華南甚至中國保留了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提倡社會主義文化，打倒舊文化的氣氛下，很多具地方色彩的文化被當成「舊文化」而遺忘及消失，以至新界成為了中外學者研究南中國原居民文化如打醮等的田野實習地點。造成這個現象，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港府採取不干預新界鄉村的政策。當然，新界村民因經濟原因，到港九打工，甚至大規模出國，而使部分村落荒廢，則作別論。

由新界的鄉村氛圍，可以看出，港九與新界一直以來的城鄉分野十分明顯。因此，放在整個香港地區加以考察，不難發現港九和新界的功能關係基本上是一種補給型的城鄉關係：香港大部分的物資均依靠進口，所以新界農田供應給香港的不是主要糧食如小麥、米等，而是「土特產」：「九龍城豉油，大埔鮮魚，荃灣波蘿，長洲大蜆，大澳海鮮，屯門腐竹」¹⁸，這構成了港九人士往新界郊遊的一項目的和動機。城鄉這種互不侵犯的關係，到了 1960、70 年代開始，出現了城鄉爭地的現象：政府由於需要發展新市鎮，便需要將新界農村土地收回作都市化用途。另一方面，1960、70 年代香港旅遊業出現了另一波的發展。¹⁹ 政府積極計劃發展具旅遊潛力的地方，包括將淺水灣發展成威基基的國際級泳場；在大嶼山愉景灣地方發展國際級渡假中心，等等。其中一個觸目的計劃，是在已經確定發展成新市鎮的沙田建設獅子山纜車，「工程包括在山腳車站，設有停車場、酒

¹⁸ 《華僑日報》，1930 年 6 月 3 日。

¹⁹ 香港最早於 1930 年代開始由政府主動發展旅遊。1929 年全球經濟大危機後，香港也被波及，港府決定採取兩個方法挽救經濟，一是發展工業，二是發展旅遊。1935 年，「香港旅行會」(Hong Kong Travels Association)成立，動員各團體向世界各地尤其是國內介紹，並邀請霍士電影公司拍攝香港風光紀錄片，推介香港的風景。有關香港的旅遊史簡介，見楊穎宇，「從香港旅業史看香港旅業的前景」，《成報》2005 年 3 月 15 日。

家及商店，以方便遊客。在山頂車站，除酒家及商店外並有直升機升降地方。」²⁰ 計劃若成功，則用現在的術語說便可以讓沙田「城市化」和「旅遊化」達致雙贏局面。然而，計劃因為沒有合適的承建商投標而不了了之，而同一時候另一個有關沙田的工程，即獅子山隧道第二條管道則加緊進行，最後於 1978 年通車。是項工程得以順利完成，反映了沙田都市化的實際需要：來往沙田和九龍市區的巴士數量，1976 年增至 185,922 架次，比 1975 年多了倍半以上。²¹ 因此，從上述公共工程的角度來，沙田的城市化最後壓倒了其他的發展需要。

書目表：

王賡武，《香港史新編(Hong Kong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vol.1,2) (香港：三聯出版社，1997).

劉存寬、余繩武，《十九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4).

余繩武、劉蜀永，《20 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5).

丁新豹主編，《香港歷史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2008).

Carroll, John M.,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7).

Eitel, Ernest J., *History of Hong Kong* (1895).

Empson, Hal, *Mapping Hong Kong: A Historical Atlas* (Hong Ko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1992).

Tsang, Steve,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New York: I.B. Tauris, 2004).

Wesley-Smith, Peter, *Unequal Treaty 1898-1997: China, Great Britain, and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²⁰ 《華僑日報》1974 年 7 月 29 日。

²¹ 《華僑日報》1977 年 3 月 22 日。